

公 / 共 / 管 / 理 / 研 / 究 / 书 / 系

留城还是返乡?

——流动人口的消费困局与社会融合

杨云彦 谭江蓉 褚清华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经济转型中的农民工能力发展与社会融合”(项目编号: 71173240)资助出版

公 / 共 / 管 / 理 / 研 / 究 / 书 / 系

留城还是返乡?

——流动人口的消费困局与社会融合

杨云彦 谭江蓉 褚清华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留城还是返乡:流动人口的消费困局与社会融合/杨云彦,谭江蓉,褚清华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3

ISBN 978-7-5609-9974-6

I. ①留… II. ①杨… ②谭… ③褚… III. ①流动人口-消费者行为论-中国 ②流动人口-社会问题-研究-中国 IV. ①F713.55 ②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5726 号

留城还是返乡? ——流动人口的消费困局与社会融合

杨云彦 谭江蓉 褚清华 著

策划编辑:张馨芳

责任编辑:殷茵

封面设计:刘卉

责任校对:张会军

责任监印:朱玢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5

录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刷: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0.5 插页:1

字数:211千字

版次:2014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36.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P e r f a c e

...

.....

稳步推进数以亿计的农业转移人口和谐融入城市,按照城市居民的方式工作和生活,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继续推进城镇化的基础。虽然与农村居民相比,流动人口摆脱了自产自销的传统消费模式,开始学习掌握城市现代化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手段,引领着农村消费潮流,但实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消费水平或相似的消费模式、可以在城市体面工作与生活,依旧是大多数流动人口难以跨越的奢望。如何通过体制改革、政策帮扶与社会支持,改善流动人口的收入、消费和实际福利水平,帮助流动人口在城市体面生存,实现“留城”梦想,极具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市工业化进程,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空间地域转移。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使得进城的农民没有实现非农户籍身份的同步转换,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是成了城市的流动人口,在很大程度上形成“有流动、无迁移”的复杂局面,进而导致流动人口在适应城市、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时面临严峻考验,特别是在消费上陷入低效的“两难”困局:他们在城市迫切需要通过增加收入来提高消费和福利水平,但受制于收入及未来发展预期,流动人口消费能力不足或有钱也尽量压缩在城市的消费;考虑到将来返回农村养老、子女教育支出和婚姻压力等现实,流动人口又被迫在农村修建房屋、购买大件消费品等,但在很长的外出务工期间,房屋和这些大件消费品的使用效率极低,甚至长期处于完全闲置的状态。流动人口这种在城市消费能力不足、不敢消费与农村低效率消费同时并存的情形,我们称之为“流动人口消费困局”。

作为中国当前最大的结构调整,城市化是最大的内需源泉,也是最大的改革红利,但享受这一红利必须切实解决好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社会融合问题。流动人口只有真正融入城市,在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上贴近市民,城市化才能真正释放出巨大的消费需求。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仍面临诸多阻碍时,外界所理解的流动人口消费困局实际上是群体自身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第一代流动人口已经或即将退出劳动市场,有别于父辈的新生代流动人口逐



渐成为流动人口的主力军。同时,新农村建设真正取得实效,还需要把更多的农村人口稳步向城市转移,这些都离不开已有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和谐融入。从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出发,改善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产、生活环境,提高群体在流入地城市的生活福利水平,是转型时期促进社会稳定、实现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

以往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就业与收入,本研究最大的特色是从关注流动人口就业、收入视角转向更加能够体现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实际福利水平的消费视角,真正抓住了“人”的城市化的核心和关键。流动人口只有不断改善自身的社会融合状况,才可能有能力、有意愿逐渐提高在城市的消费比重。没有良好的社会融合,流动人口消费困局长期得不到调整和改善,正在发生的城市化进程将随时可能出现断裂和反复,从而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此外,当前世界各国普遍处于“消费社会”阶段,消费行为是研究社会分层的重要维度之一,从社会融合探讨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也是重要的研究视角创新。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在简要回顾消费行为与社会融合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利用全国大样本调研数据,细致描述了流动人口的消费特征与社会融合状况。第二部分从流动人口消费困局的决定因素出发,分别从经济和心理两个维度理论探讨社会融合是如何影响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第三部分实证分析了流动人口消费行为与社会融合的相互关系。第四部分在测算社会融合如何促进流动人口消费潜力释放的基础上,以促进社会融合为切入点,探讨和破解流动人口消费困局的相关政策建议。

本书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名称:经济转型中的农民工能力发展与社会融合;项目编号:711732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时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项目名称:城市融入背景下流动人口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研究;项目编号:13YJC840033)和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2年招标课题(项目名称:流动人口消费行为与城市融入)的鼎力支持。全书由杨云彦教授提出总体框架并负责统稿,具体撰写人员有:褚清华、杨云彦(第一章第二节,第二章第二、三节,第三章第二节,第五章),谭江蓉(第一章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第四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石智雷(第九章),杨云彦、谭江蓉、褚清华、石智雷(第十章)。项目研究团队成员亦有贡献。

本书使用的调研数据得到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现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的大力支持,在武汉市开展的抽样调查也得到了湖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现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武汉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现武汉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相关部门的具体配合,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与社会融合 /1

第一节 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 /1

第二节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9

第二章 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特征 /19

第一节 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总体描述 /19

第二节 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纵向比较 /38

第三节 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横向比较 /41

第三章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 /55

第一节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现状 /55

第二节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进程测度及应用 /63

第四章 流动人口消费困局缘何存在? /83

第一节 长期保障与流动人口跨期消费 /83

第二节 身份认同与流动人口跨区消费 /86

第五章 消费行为反映了流动人口融合意愿? /91

第一节 消费行为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意愿的关系 /91



第二节 流动人口消费行为反映融合意愿的计量检验 /94

第六章 经济整合影响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 /101

第一节 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收入决定 /101

第二节 流动人口的收入与消费 /108

第七章 社会保障影响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 /115

第一节 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与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描述 /115

第二节 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与消费行为关系的计量检验 /120

第八章 身份认同影响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 /131

第一节 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与消费行为 /131

第二节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与消费行为的计量检验 /134

第九章 流动人口消费行为与社会融合:

典型区域分析 /139

第一节 武汉市调查的基本情况 /139

第二节 在汉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 /141

第三节 在汉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144

第十章 促进社会融合,破解流动人口消费困局 /149

第一节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能释放多大消费潜力? /149

第二节 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优化群体消费行为 /152

参考文献 /157

· 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与社会融合 ·

本章简要回顾已有涉及流动人口消费行为与社会融合的相关研究,为后续全面掌握和深入分析流动人口消费困局形成全过程及背后原因奠定基础。

第一节 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

已有对于消费的研究主要围绕城市居民^①和农村居民展开,但是流动人口居住分散,流动性强,收入水平低,消费水平更低,而且数据收集困难,为开展研究增加了一定难度。宏观数据有力地支持了对城市和农村人口消费行为的研究,对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研究却显得乏力。按照我国目前常住人口的统计方法,流动人口按照流入时间长短计入城市常住人口或者农村人口。宏观数据对于流动人口消费的支持力度不够,使得对于流动人口消费的研究要么着重于理论阐述,要么采用规模和范围有限的微观调查数据进行一定的描述与解释。

一、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现状与特征

通过对宜昌市农民工消费的调查,李淋、冯桂林(1996)发现在消费结构方面,农民工享受和发展性消费贫乏,简朴型消费明显,层次差别悬殊;在消费方式方面,单调且高度同质,封闭而逐渐开放。同时通过对农民工消费行为的深层分析得出启示:第一,农民工的消费受制于生活标准和地位评价标准。农民工的消费行为主要反映了农村社会体系功能维持的文化导向,不论是从环境适应、目标达到,还是从模式维持和整合来看,其与城市社会模式都无法相符。而从农村社会的模式来看,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却又是合理而又稳定的选择。第二,农民工的两种参照群体反映了传统与现代的冲撞。一方面,农民工认为他们的消费模式主要

^① 除引用文献中与与原文献保持一致,在相关居民统计口径中使用“城镇居民”外,其他统一使用“城市居民”。

应符合原来家乡和现有民工群体的成员资格模式，他们的主要参照群体在家乡；另一方面，处于不同空间位置的农民工，在实现自己的消费行为时，也在相应参照其生活圈子之外但与之处于相同位置的人的模式，这个参照系便也包括了城里人。两种参照群体，实际上反映了传统与现代两种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的冲撞。农民工作为农民，他们要参照家乡成员及打工者群体的消费方式，而作为城市打工族，他们又不可避免地要参照城里的某些消费方式。这种矛盾的处境，构成了农民工消费方式的本质特征。第三，现代化与农民消费。进城打工为部分农民提供了加速人的现代化的契机。随着整体素质的提高，他们的消费将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展。现代化不仅从消费角度向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他们的消费行为、消费方式的变革必将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严翊君(2007)对长三角江苏八城市农民工消费的调查研究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整体消费水平的变化，长三角农民工的消费方式正在悄然转型，表现为：消费结构正从简单转向复杂，消费工具正从传统转向现代，消费行为正从保守转向开放，消费心理正从后卫转向前卫。然而这种转型只是一个开端，它孕育着发展的良好趋势，也呈现着发展的许多不足。这种矛盾性表现为结构性转型明显，平台式提升不快；消费心理的转化快于消费基础的提高；文化教育消费偏低，食品居住支出居高。因此应采取各种有效政策措施，推进农民工消费方式有序、合理、健康转型。

王蔚(2012)在对成都市温江区流动人口调查的基础上，归纳出流动人口的以下消费特点：传统与现代消费观念并存；基本生活消费占比较高且对当地经济发展有推动作用；消费方式单调且同质化严重；流动人口对生活状态的满意度较高。

张咏梅、肖敏霞(2008)对兰州市进城务工人员的抽样调查发现，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在整个社会分层结构中处于比较低的层次。

欧阳力胜(2006)则以湘潭市农民工为例，总结出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呈现理智型和经济型特征。

于丽敏(2010)认为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分化出来的一个特殊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其形成过程具有极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和历史背景。这导致他们在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扮演上具有独特的群体特征，同时也决定了他们的消费行为具有二元性特征和阶段性特征。

王曼(2005)通过考察北京农民工的消费选择发现，农民工的消费行为突出表现为：支出行为主要以当期收入为预算约束；求廉的理性消费占主导；消费构成偏重于食物；购物范围集中于大众型商店；通过人际来源获得消费信息。

钱雪飞(2003)在对南京市 578 名农民工消费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农民工消费在收入中所占比重较高，消费水平及质量与城市居民相比虽处底层但自我满意度

较高,农民工内部有一定程度的分化。

李海峰(2008)基于对安徽省三市(合肥市、安庆市、淮北市)务工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及家庭生活状况的调研,比较了农民工家庭在城市和农村的消费结构。在城市,农民工家庭消费主要以食品支出和房租为主;在农村,农民工家庭消费主要以食品支出、子女教育和人情交际费用为主。农民工家庭在城市和农村的消费支出比例接近2:1。

二、流动人口消费行为影响因素

与一般的消费影响因素的分析不同,流动人口消费由于多从微观数据入手,因此影响因素多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李淋、冯桂林(1996)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会环境因素方面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个人、家庭和社会环境诸因素均对农民工的消费行为产生影响,而且有些因素的影响较为显著,影响消费项目较多,相关数值比较高。如个人因素中的年龄和打工工龄、家庭因素中的母亲受教育程度、社会环境因素中的行业性质和职业岗位等,就显得较为突出。

张咏梅、肖敏霞(2008)分析了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婚姻、文化程度等个体特征对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25岁以下的人用于城市生活的开销占收入的比例相对较低,通过婚姻状况与消费比例的交互分析反映出已婚者的消费比例较大。文化程度、外出打工时间的长短等因素对农民工在城市中消费水平的影响不是很明显。

潘洪涛、陆林(2008)亦认为,应从收入、家庭结构、个人特点三个方面考察影响农民工消费行为的因素。

于丽敏(2010)基于农民工消费的二元性与阶段性特征,从收入、汇款和制度因素三个方面考察了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认为较低的工资水平和不稳定的收入最大限度地制约了农民工消费;农民工往家乡汇款比例畸高,他们的消费还处于以满足生存需要为主的水平,是城市消费市场尤其是低端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消费倾向既低于农村居民也低于城镇居民,存在巨大的消费空间;制度因素是当前农民工不能大胆消费的最大瓶颈,户籍限制是影响农民工消费行为的制度根源。

欧阳力胜(2006)从影响农民工消费的社会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体制对农民工消费存在制约,农民工与农村密切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

周林刚(2007)从新都市社会学的集体消费视角出发,在对集体消费品进行分类的基础上,以深圳市的实证调查资料为依据,重点分析了农民工集体消费的基

本状况及其影响变量。结果显示,地位结构、制度身份及关内、关外二元结构是制约农民工集体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不仅表现在生产领域,而且反映在集体消费领域。

王劲松(2007)也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农民工的消费行为是伴随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出现而产生的,其消费行为受到农村传统消费观念和城市居民消费观念的影响。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在社会参与和社会地位上处于边缘态势,通过家庭利他主义的消费行为,农民工建构起了属于自己的消费观念;通过模仿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农民工寻求着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

祝伟(2012)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在身份认同上倾向于城市居民,并在消费活动中参照城市居民进行印象管理,而品牌服饰、城市化的娱乐方式、信息化消费及高档商品消费是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印象管理”的重要方面,这是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的一种典型行为和心里。身份认同的基本含义是个体对于所属的基本社会文化的认同,个人所认同的身份是一种具有社会属性的社会身份。当我们赋予身份以社会属性时就会发现,消费行为与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消费方式是实现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主动建构着消费主体的身份地位;另一方面,身份认同又决定了消费方式,人们总是选择与自己身份相一致的消费方式。

陈斌开等(2010)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微观家庭调查(CHIPS)数据,研究了户籍制度对于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城镇移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低 14.6 个百分点。如果不考虑政策调整的一般均衡效应,放松户籍限制可以使 2002 年移民人均消费水平提高 20.8%,居民总体消费水平提高 2.2%,这可以抵补 2002—2003 年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 47.1%。如果将同样的参数运用在 2000—2005 年期间,那么,被户籍制度制约的移民消费相当于这一期间消费率下降的 40.8%~64.2%。

陶树果(2008)认为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二元性,不仅由于其家庭经济收入相对较低,还与其务工的暂时性和不稳定性、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参照群体的双重性及与农村的联系密切等农民工家庭自身层面的因素有关,也与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传统文化的影响、土地保障功能的削弱及社会支持网络的局限等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有关。归根结底,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二元性受到我国城乡二元性社会结构的刚性制约。

肖伟、阳慎初(2008)研究认为在影响 80 后农民工消费观念的众多因素中,自我因素与市民化意愿因素是引起消费观念变迁的主要因素,80 后农民工的消费观念在自身的主观意愿和外界环境的影响下发生了转变,他们逐渐地摒弃传统的落后封闭的消费观念,而转向现代开放的消费观念。

三、流动人口的具体消费行为

宛恬伊(2010)基于代际差异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水平和住房消费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与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单位宿舍/工棚的比例显著高于一代农民工。两组人群在居住水平上存在一定差异,非租房来源下,两代农民工的居住水平整体偏低,新生代农民工稍好于一代农民工;租房来源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合租比例较高,其租住的房屋类型和房屋设施优于一代农民工。不同住房来源下,两组人群在房租支付水平上无显著差异。

王玲杰(2010)在流动人口结婚消费状况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从结婚消费额、消费构成、资金来源等方面对二十年来流动人口结婚消费状况的发展变化进行统计分析,并对城乡差异进行比较。研究表明,二十年来流动人口的结婚消费额不断上升,消费构成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其中,建房买房及装修费用迅速增长;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结婚时父母是主要费用出资方,而城市户籍流动人口结婚时本人出资比例不断提高并逐渐超过父母出资比例。

张永红(2011)对湖南株洲和广东广州两地的农民工进行调研时发现,“闲时”、“闲钱”是休闲消费必不可少的前提,然而,不少农民工“闲时”、“闲钱”还缺乏,休闲消费能力有限。同时,部分农民工休闲观念有失偏颇,休闲技能缺乏,休闲消费存在误区。破解农民工的休闲消费问题,提升农民工的休闲消费能力和品位,一要更新观念,明确休闲消费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要强化法律的权威,落实相关待遇,提高广大农民工的休闲消费能力;要加强休闲消费教育,优化农民工的休闲消费行为。

方学军(2011)对农民工的精神文化消费做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精神文化消费意愿及其文化消费质量普遍偏低;接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导致农民工精神文化诉求有所区别;生活环境的巨大差异导致农民工精神文化消费观念存在差异。自身的经济基础以及文化素养、政府和社会提供的文化设施等都是直接导致农民工形成相对封闭的精神文化消费圈的相当重要的影响因素。

王艳华(2007)着力探讨进城农民工文化消费行为上出现的代际差异,对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群体的文化消费行为进行比较,分析认为60年代的农民工更多受家乡生活环境的影响,进城后他们的物质生活有所改进,生活满意度高,但在文化生活领域没有大的改观,没有实现消费文化观念转型,还是传统人的特征。80年代的农民工对新鲜事物接受能力强,渴望融入城市,更多受城市生活环境的影响,并以城市人作为参照群体,出现了消费价值观念和消费方式的现代转型,具备传统人向现代人过渡的特征。

彭静(2011)通过对温州市龙湾区进城农民工的培训消费行为进行调查,发现



进城农民工具具有强烈的培训消费动机,但就业渠道单一、农民工对于培训项目的片面认识等限制因素制约了将培训消费动机转化为培训消费行为。

马春建(2008)调查河南省外出农民工的体育消费发现,经济收入制约着城市农民工的体育消费,相当大一部分农民工没有参与体育消费。农民工的体育消费以实物型消费为主,占总消费的 73.7%,且结构不合理;而非实物消费又以体育彩票的博弈型体育消费为主,占 18.3%。

四、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研究趋势与展望

1. 研究范式:多学科综合

多年来,在消费行为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以收入-消费关系为主线的消费经济学研究。近些年来,消费者心理成为解释不确定等价下理论与数据分歧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通常不确定性主要指消费者收入的不确定性,因此大量研究采用家庭收入消费动态调查数据来衡量不确定性的程度并引入模型以分析消费者行为。而从消费者心理角度出发,真正影响消费决策的可能不是真实的收入波动,而是消费者的心理预期。因此,对消费者心理和偏好的研究就成为一个重要且广阔的发展方向,并与心理学有着宽泛的交集。虽然关于理性预期的研究并不新鲜,但是这条思路的延伸却给出了许多新设想和新热点,如消费者双曲线偏好、文化和习惯对偏好的影响等,这些研究不仅解决了许多经验研究的矛盾,也为进一步更加准确地描述消费者行为拓展了思路,同时也提示我们多视野构筑符合我国国情的消费函数理论框架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

尽管如此,如何将行为和心理理论整合入消费经济学仍然是一个难题。

示范效应——消费者所处的消费层次和社会阶层对消费决策的重要影响——的提出为从社会学视野研究消费者行为打开了一扇窗口,大量数据显示消费者的偏好不仅仅取决于其个人消费,更受到周围人消费的影响。经典理论给出的一种解释是资源并不是在竞争市场中进行分配,而是在与消费层次密切相关的部分群体中进行分配,因此,周围人对消费者的决策将产生重要影响;另外一种更为彻底的方法源自行为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即将周围人的消费直接引入效用函数。然而这种激进的方法可能带来很多负面效果,其中一点即是构建的偏好集可能无穷大。Noldeke 和 Samuelson(2005)采用“逆转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的方法从人类进化学的角度分析了比较消费效用的意义,认为周围人的消费所包含的环境信息可以为消费者决策提供支持,因此在环境无法被准确观察的情况下,比较消费效用是有益于消费决策的,然而人们的感知偏差也会导致无效决策。

从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人口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视野出发,全方位更准确地描述流动人口消费行为并估计重要参数理应成为研究流动人口消费行

为的重要目标,方法的进步和思路的拓展是发展的两大方向。基于不确定等价以及从消费者心理和行为出发的各种研究成果形成了广阔的思维空间,许多思路受到重视并得到运用,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视野将为消费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2. 研究思路:以消费者行为理论分析为出发点

目前我国关于消费的研究模式主要是利用中国的数据拟合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各种消费假说,并以相关系数和其他几种统计量的优劣判断不同消费函数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而做出种种推论。这种研究思路与模式的缺憾之处,在于建模前缺乏消费者行为理论分析。凯恩斯在1973年就指出,消费动机或者说储蓄动机,是随假定的经济制度与经济组织,随种族、教育、成规、宗教及流行的道德观念等因素所形成的习惯,且根据现在的希望与过去的经验、承受资本设备的多寡与技术、目前财富分配办法以及社会各阶层已经确立的生活态度,而大有不同。这种对于居民消费的不同影响,显然是不可忽略的。现代经济学的消费函数理论主要是基于对消费者行为的外部环境设定和内在设定,在新古典学派范式内发展起来的,而新古典学派范式深深植根于现代西方社会制度、经济组织等土壤之中。中国的社会制度、经济组织等与西方社会有许多重要的不同之处,尤其是制度与结构因素,这一点在研究我国的居民消费时是要格外关注的,因为正是种种制度与结构因素从客观与主观上制约着消费者行为的形成,对消费者行为造成影响。

我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文化大国,这一基本属性决定了我国消费者行为研究背景的复杂性。作为一个快速发展中的文化大国,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不可能不对消费者心理产生区别于其他国家消费者的重大差异。在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受这种差异强化的社会、心理、文化以及二元结构必然加剧经济研究的不确定性,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消费者自身的社会、心理、文化特质以及快速转型的制度背景决定了西方消费经济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时的苍白无力。我国的消费研究必然要深刻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国情,由文化特质决定的消费者心理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是理论研究者必然面临的挑战。转型背景下我国消费者面临的经济约束、社会结构以及制度环境将为消费经济研究增添更多的不确定性,当然这也最有可能成为未来消费经济理论创新的生长点。

二元结构的格局与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决定了我国居民消费的多层次板块性特征,社会的快速转型与经济的快速转轨又决定了居民消费水平、结构与行为的持续不稳定性。Carroll(1997)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移居美国的人群进行分析,证明群体性差异确实存在。因此,分城乡、分阶段、分地区、分类别是我国消费经济研究必须注意的几个方面。研究当前的中国消费经济问题,既不能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比如把研究城市居民的模型与方法不加分析地用在农村居民消费函数的研究上,又不能固守传统的研究路径,要坚持实事求是和问题意识,坚持分城



乡、分阶段、分地区、分类别的原则对待中国消费经济问题的研究(朱信凯、骆晨, 2011)。由于我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无论从消费水平、消费结构、观念习惯等哪个角度出发,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都有显著的差异,那么将他们放在同一个模型中进行讨论显然是不合适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庞大的游走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流动人口群体,其消费行为连通着打工城市与家乡农村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理念,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还会持续加入规模已经庞大的进城务工者行列并会在未来几十年不断沉淀下来。如何把握这一历史性动态过程,挖掘这个群体在我国居民消费行为中扮演的角色以更好地促进群体城市融入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 研究方法:关注微观基础

尽管许多消费函数研究关注的重点在于对宏观经济的预测和指导,但事实证明缺少坚实的微观基础往往导致宏观预测的失败。目前绝大多数结构化模型建立在代表性消费者的跨期选择行为之上,却使用宏观数据来估计模型的参数,而从宏观数据中推断微观行为所需要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且在现实中很难满足。由微观到宏观的过程,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加总,忽略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造成理论的失误和经验研究的偏差,甚至得到矛盾的结果。

现代消费理论是以家庭消费效用最大化为基础的,因此应该用微观数据研究消费与收入的关系。在我国因为住户调查数据很难获得,大多数研究采用的都是经过综合的数据(如全国或某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等)。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不同群体之间消费行为的差异以及个体收入或个体消费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被综合掉了,最终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估计结果的可靠性。Attanasio 和 Browning(1995)的研究表明,在过度敏感性为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理论挖掘的陷阱中,人口的统计特征可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指出利用宏观加总数据分析代表性消费者模型是不合理的,生命周期理论被数据拒绝的原因可能就是不恰当的参数估计。虽然许多学者将其归结为流动性约束的限制,但他们认为加总误差以及不恰当地描述消费对人口统计特征的依赖性才是模型被拒绝的主要原因。

多数消费函数研究建立在代表性消费者假设之上,而事实上“消费不平等”现象普遍存在,个体差异及其变化对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往往具有重要意义。人口统计特征是微观数据中包含的重要信息,人口增长、人口结构和家庭构成都可能成为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而宏观数据在汇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损失掉相当的人口统计特征信息,并且由于宏观汇总数据在数据上的单一性迫使研究层面的选择空间狭窄,从而无法从微观角度对消费行为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和分析。

目前从微观视角出发的居民消费研究,主要停留于对消费的现状与特征的描述上,基于微观基础深度解释消费行为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同时,由于微观调研

的范围和规模的原因,其研究结果的代表性也比较有限。因此,更大范围和规模、有一定时序可比性的微观调研数据也是下一步研究所需要的。

第二节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对于社会融合的研究始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考察,发展于对移民以及不同族群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视角和方法适用于流动人口的分析。

一、社会融合国外研究及实践

国外的社会融合研究与实践主要从社会排斥现象出发,围绕着外来移民、弱势群体与主流社会的关系问题展开。法国社会学家 Durkheim(1951)在对自杀现象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了“社会融合”概念,认为较好的社会融合水平(个人与其他人或者社区保持紧密关系)可以防止由于社会原因而导致的自杀。

同化论先驱 Park、Burgess 等人(1928)将融合视为群体和个人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过程,即个人与群体从其他群体获得记忆、情感、态度,并且共享他们的经历和历史,逐渐融汇成共同的文化生活。Gordon(1964)认为应该从七个方面来测量族群的社会融合程度:文化接触、结构性同化、通婚、族群认同、偏见、歧视、价值和权力冲突。后来,Gordon(1981)还提出了以美国作为文化“大熔炉”的理论。针对同化论不能很好解释美国文化和种族的多元化现象,Portes 等人(1980,1995)提出了“隔离融合”(segmented assimilation),认为不同社会群体相互作用、相互适应,不以文化多样性的牺牲为代价,最终使得所有的社会参与者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在实证研究上,Dustmann(1996)利用德国的调查数据,使用 Order Probit 模型研究了外来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发现个人特征、种族和家庭规模是影响移民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而受教育年限、培训、职业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Kuhn 和 Sweetman(2002)利用加拿大 1991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现离开保留地的印第安人通过提高技能和改变生活习惯成功地融入了主流社会。Galloway 和 Aaberge(2005)以挪威的外来移民为研究对象,发现虽然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速度并不快,但是明显从整体上减少了外来移民的贫困发生率。Mueller(2006)发现德国的土耳其移民已经处于社会边缘地位,大部分的土耳其移民由于宗教歧视、有限的教育资源的获取和低收入等原因,已经形成与主流社会并存的“平行社会”。

在政策实践层面,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加拿大以及欧盟、联合国等一些国际



组织的政策分析家和政策制定者对社会融合政策及其实施效果给予了极大关注。其中欧盟制定了一整套度量社会融合的工具和方法,并不断改进。

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国内研究进展

借鉴国外有关社会融合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流动人口^①迁移及对城市经济社会的特殊性影响,国内社会科学界给予了该领域高度的关注和深刻的研究(田凯,1995;李强,1995;李培林,1996)。从政策管理角度看,我国流动人口政策经历了从“管制流动”到“融合开放”的重大转变。以1994年劳动部发布《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1995年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颁布《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和1997年4月成立流动人口专门管理机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为主要标志,国家逐步建立了基于暂住证、就业证、收容遣返、本地就业优先为主要内容的人口流动管制政策,计划管理的政策思想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比较明显。

进入21世纪,特别是随着“三农”问题的进一步凸显以及农民工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我国流动人口政策出现重大转变。2002年中共中央《关于做好2002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中首次提出了针对农民进城务工的“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十六字方针,并提出要“纠正简单粗暴清退农民工的做法”,“健全进城务工农民的劳动合同管理,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特别是2006年国务院颁发《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央政府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了涉及农民工工资、就业、技能培训、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和服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土地承包权益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平等、开放、融合、发展等特征逐渐成为我国针对流动人口的主要政策内容。

(一) 社会融合的理论探讨

国内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理论阐述主要有两条主线。

一是社会学学者从人口流动的社会现象及存在的社会问题出发,研究农民向市民转化的实质、过程及障碍等。田凯(1995)认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过程,实际上是他们继儿童、青少年阶段早期社会化之后的一个继续社会化过程。一个外来农民,要想真正适应城市生活,为城市文化所接纳,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首先,他应能在城市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其次,这种职业带来的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能够形成一种与当地人的生活接近的生活方式,从而使其具备与当地人生

^① 由于农民工构成了流动人口的主体,国内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研究主要围绕农民工展开。本节在引文中没有严格区分这种差别,直接按照原文表述引用。